

中国文化的边界 薛涌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C539

7

2006

中国文化的边界

薛涌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化的边界/薛涌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 1

ISBN 7 - 222 - 04591 - 0

I. 中... II. 薛...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6304 号

责任编辑: 王小燕 冯 琰

装帧设计: 陶汝昌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中国文化的边界
作 者	薛 涌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 peoplespace. net
E - mail	rmszbs@ 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87 × 960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45 千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排 版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7 - 222 - 04591 - 0
定 价	25.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目录

西学之必要	/1
反西方主义的陷阱	/4
学术就是学术	/7
甘阳的清谈误国	/9
文化帝国主义	/11
洋广告与国人的受害者情结	/13
为传统节日送葬	/15
传统必须通过“西化”才能复兴	/17
“新语文运动”的精神应该是什么?	/20
基层社会与中国的现代精神	/23
纪念费孝通	/25
到哪里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	/27
伟大的文学需要伟大的心灵	/29
郑家栋事件到底和儒学有无关系?	/31
“借鉴”之后能偿还吗?	/33
国学不要大跃进	/35
国学院的缘起要深究	/37
中国没有“美国学”!	/40
建立中国的美国学	/42
美国的“中国话语”	/45
美国媒体的高产	/47
美国的“新种族”	/49
中国文化的边界	/51
高考作文在塑造什么样的人格?	/56
高考作文:人生命题	/58
高考何时才能改革?	/61
高考如何改革?	/63
重新设计高考	/65
是高分复读还是一落千丈?	/68
大学生为什么要住校?	/70
博导当除	/72
义务教育需要新思维	/75
大城市能否引入学区制?	/77
捐助背后要有思想	/79

政府不要干涉小留学生	/81
谁来取出“长城砖”?	/83
岳飞:中国的教科书事件	/85
科举为何当废?	/88
“海归”之忧	/91
走向封闭的教育	/93
英语没有浪费教育资源	/95
英语考试应该民办	/97
汉语考试应该普及	/100
汉语的开放	/102
外国人赢得汉语大赛的随想	/104
到底谁有病?	/106
飙车:炫耀性的反叛	/108
未成年人的道德成长	/110
暑假的孩子	/112
文艺复兴式的人	/114
美国人越来越爱读书	/117
读书率下降是什么危机?	/119
改造我们的读书生活	/121
公共图书馆属于公民的权利	/123
公共图书馆:文明的见证	/125
转型中的城市	/127
“去工业化”的波士顿	/129
个人自由与公共精神	
——汽车社会之反省	/131
城市的流浪精神	/135
作为教育的体育	/137
体育首先要教育化	/139
中国人还是“东亚病夫”!	/141
奥运之后	/143
姚明的品德	/145
刘翔代表着什么?	/147
刘翔不需要拯救	/149
禁止高尔夫	/151
上海有世界博物馆吗?	/153

地方官要不要出国？	
——评狮子为什么不能向老虎学	/155
从古迹门票涨价看中国人的历史意识	/157
我们是否还在走郑和的路？	/159
专家意见与知识分子崇拜	/162
假如余斌真是受贿扶贫	/164
照片的历史层面	/167
正视二战的遗产	/170
日本的故事	/172
小泉为什么拜靖国神社？	/174
欧美的历史撞击	/176
歧视河南人的缘由	/181
敬畏自然	/183
正视网络语言	/185
头衔游戏	/187
安德鲁和贝聿铭	/189
报是给人看的	/191
励志的文化空洞	/193
老龄化不仅关乎老人	/195
我们离母系社会还有多远？	/197
女人当道	/202
吃分中西	/205
中国的富人缺什么？	/207
财富的品格	/209
不要把“中产阶级”庸俗化	/212
纪念董乐山先生	/214

西学之必要

“文化霸权”是近年中国学术界通行的一张钞票。不仅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将之当作口头禅，甚至长期致力于介绍西方学术文化的学者，也开始谈起来。仿佛活在这个世道上，不知道“文化霸权”，就属于落伍、过时的拾人牙慧之徒。这也就是为什么邓正来先生在《新京报》上呼吁警惕“文化霸权”之后，我要撰文表达不同意见的原因。在我看来，中国对西方学术，还是一知半解。刚刚入门，就一天到晚要警惕人家这个，怀疑人家那个，还能学到东西吗？西方的学术，当然不是惟一的学术，但毕竟是当今世界学术的主流。我们应该有其他门派的学术与西方的学术竞争，但中国这么一个走向世界的崛起大国，当然不应该排斥世界的主流学术传统。相反，我们急需在中国建立西方的学术体系，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之一。这一挑战，不比振兴传统的学问要小。可惜，目前学界喊警惕西方的“文化霸权”太凶，反而对于中国西学之浅薄缺乏认识。

在这方面，我们实际上正在退化，见识远远比不上老一代学人。近读何柄棣先生回忆胡适的文章，就深感前辈对西学体会比我们深，危机感也比我们重。

1960年何柄棣见胡适，这是两人在胡适生前最后的一次谈话。胡适严肃地对何说：“柄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记得我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不但承继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但是他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等等……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对照现在动不动就要反西方“文化霸权”的学界，老辈学者实在是诚恳、老实得多。何柄棣在上个世纪4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英国及欧洲史博士学

位，后转入中国史研究。在那一代研究中国的学人中，他和费孝通怕是成就最高的了。他们的成就，都和成功地吸取了西学之长密不可分。比如何柄棣通过科举考试对明清时代社会流动的分析；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对江南农村的调查，大量运用了西方实证性的学术方法：数据、统计、田野调查等等。他们的成就，如今也很少人能够超过。

不过，也正是何柄棣这样的学者，对五四以来中国对西学的吸收的弱点才看得最清楚。可惜他自己并没有具体说明。笔者从自己的本行历史学的立场，不妨简单地归纳一二。

五四一代，骨子里还是秉承士大夫的传统。接受西学时，也被士大夫的口味所局限。首先，士大夫讲究文人气，技术性很差。就像文人画，写意不写真，否则就变成了死用功，工匠气太重，为士林所轻。甚至搞雕塑，因为用的工具不是毛笔而是锤子、凿子，就被开除士籍，成了卖劳动力的“小人”。傅斯年（孟真）办史语所，对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比较宗教等，很容易拿来为己用，因为这些学问，基本可以坐在书斋里清谈，对士大夫的文人气质和生活方式没有改变，但是，一涉及统计、数据、田野调查等等，就不是坐在书斋里写几笔毛笔字可以对付的了。其实胡适真要治史，在美国学农学正是个绝好的起点，因为到他进入康奈尔读书时，中国基本上是个农业社会，由农学转入中国史，实在是个最理想不过的门径。可惜他士大夫气未脱，心不在此，最后研究起哲学来，因为后者在士大夫传统中还是正宗。十几年前另外一位在美国任教的大名鼎鼎的前辈无意中流露，自己干的思想史是最精英的，至于农业史、社会史等等，“还是让二流的人去搞好了”。

第二，士大夫高高在上，注意上层文化，对小民百姓的历史很少注意。地方志一般编到县。清代中期，乡镇志流行，但数量有限。村一级的历史基本上连文献也没有。所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才重要。没有这本书，我们不仅对民国时代，就是对明清时代江南基层社会的了解也会少许多。

从这两点看，何柄棣当年的抱怨，非常有的放矢。西洋的学问，有硬的有软的，中国的士大夫，专捡软的，学西方也一定学文史哲这类书斋游戏。但真碰到硬学问，比如人口统计、田野调查，或研究基层社会的历史、把握小民百姓的生活等等，这对他们来说，好比“干活”一样，嘴上不能不对之保持恭敬，最后还是敬而远之。

到了费孝通、何柄棣这代人，中国的学术才算和世界接轨了。胡适和这两个后辈如果一起留在美国教书，成就怕是比这两位小得多。胡适是思想家、启蒙者，但学术的建设还是要靠费、何这样的人。可惜，他们刚刚开始，中国学术的发展就被打断了。

如今，又来了反对“文化霸权”的呼声。毫不奇怪，“文化霸权”这样的概念，正属于笔者所谓坐在书斋里可以玩的西方的“软”学问。事实上，中国的学术，特别是史学和社会科学，还是需要西方的“硬”学问作为基本框架的。比如，从基层社会观察历史，从小民百姓的角度观察历史，建立人口史、经济史、地方社会史的规范，这些都还要借助西方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基本架构。我们现在总谈“人文危机”，实际上，我们常常有把西方的社会科学过分人文化的倾向，即去除其技术的基础，专门引其“义理”。我们应该改变的是中国式的清谈之风，回到费孝通、何柄棣那一代由西学而来的实证立场上去。

反西方主义的陷阱

自五四以来，对外来思潮兼容并包、对西方文化的倾慕，在大部分时间是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反右”、“文革”等极端时期除外）。如今，读经运动兴起，本土文化本位主义抬头，并得到一些自由派人士的响应。一位知识人干脆声言：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已经完结。

其实，读经和认同本土文化，本身并无可厚非。文化保守主义，也应是一个文明的健康因素。但如果文化保守主义与反西方主义合流，就另当别论了。遗憾的是，目前在中国掀起的这个运动，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对待传统，强调权威主义死记硬背的灌输，喊口号而不讲道理；第二，回归传统是以排斥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为前提，说中国文化是君子文化，西方文化是小人文化，颇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余韵。这就使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走向了锁闭和蒙昧。这种现象，为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中国在经济上和西方发达国家整合的时候，反西方主义的思潮反而会兴起，并且在社会上有如此之众的追随者？这种反西方主义，将为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应该说，反西方主义之所以产生于中国经济迅速进入西方世界之时，多少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基础有关。这一点，与印度一对比就能看得清楚。

中国和印度，作为当今两个最大的新兴经济，都依赖对外开放而实现了经济起飞。但是，两国的经济发展遵循的是截然不同的模式。根据 Morgan Stanley's 的首席经济学家 Stephen Roach 提供的数据，中国是走经典式的制造业发展的道路。从 1990 ~ 2003 年，工业产值在 GDP 中的比重，从 41.6% 上升到 52.3%。工业增长占这 13 年经济累积增长的 54%。印度则走的是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发展道路。在同一时期内，印度服务业在 GDP 中的比重从 40.6% 上升到 50.8%。服务业的增长占了 13 年经济累积增长的 62%。反过来比较双方的弱点：这 13 年，服务业在中国的 GDP 中所占的份额，从 31.3% 缓慢上升到 33.1%，服务业的增长仅占经济累积增长的 33%。制造业在印度的 GDP 中所占的份额，则一直徘徊在 27.2% 左右。两个国家的优势和劣势，几乎截

然相反。

中国在制造业上的成功，依赖三大优势：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大量的外资以及廉价、肯干的劳动力。不过这三大优势的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中国的基础设施虽然出色，但这往往是建立在各级政府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基础之上的。比如，一些地方想建开发区就建开发区，想圈地就圈地，想拆迁就拆迁，什么事情都是说干就干，个人的权利得不到保证。这样短期内效率当然高，基础设施当然建得快、建得好，外商当然高兴，外资也就滚滚而来了。而中国的民工，常常拿不到工钱，于是，在民工短缺时，一些厂商以“按时发工资”作为“优惠”来引诱民工。这样，劳动力成本当然低，制造业当然有竞争力。不过，这样的经济繁荣，早晚会引起社会危机。一些为制造业的崛起立下汗马功劳的老百姓，不能或很少从经济繁荣中受益。许多民工有着强烈的受压迫感。这和印度那些在服务业的崛起中充当主力的劳动阶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印度的服务业，如同中国的制造业一样，近年来抢了许多美国人的饭碗。这些行业主要集中在一些电话服务、医疗、金融咨询等方面。仅以这一领域的低端行业电话服务为例。美国的企业搞推销，常常电话打到人家里，惹得人很烦，有时回应很粗暴，所以这个行当美国人是不愿干的。再如一些产品对顾客服务的免费电话，主要是回答产品使用方面的基本问题，不需要太多知识，过去都是那些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去干。如今，这些行业，越来越多地转到了印度，通过越洋电话给美国客户服务。从业人员至少是大学毕业，工资比美国人低得多，训练、教养和服务态度却好得多。

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中国和印度不仅领导着不同的发展模式，而且培养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在中国，制造业的工人夜以继日地为外国的消费者生产产品。这在经济上很开放，但在文化上却并不开放。因为一双鞋制造出来，并不能使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有任何交流。生产者还是永远在闭塞的厂房里劳作，要打交道的，是自己的老板或工头。工作太苦、拿不到工资时，就感到受压迫，就觉得自己被人使用、剥削，就会对外面的世界产生敌对情绪，孕育了对新的“世道”的反叛。

在印度，在服务业中为美国人接电话的年轻人，大多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他们的工资比一般印度人高出许多，成为新的消费阶层。他们常常白天休息，晚上在美国的白天时间上班。最近，《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员弗里德曼为 CNN 制造了一个专题，采访那些在印度服务业中充当主力的年轻人，观后令人感慨万千。与中国劳工不同的是，他们在工作中，直接和美国的客户有个人交流。一位小姐骄傲地说，她晚饭后 6 点上班，立即通过电话进入美国

社会，帮助美国人掌握产品的使用方法，有时大家还在电话中聊一些个人生活，比如大家喜欢的电影等等。工作一晚上后，下了班走出公司，算是重新回到印度社会。这种在个人层面和美国文化的直接碰撞，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使他们成为印度社会中的文化新生代。于是，他们身上带有一种出奇的文化自信：我们是第一代在开放社会长大的印度人。我们要以我们代表的新文化，改变古老的印度社会的价值。

这种服务业的崛起，需要的是不同的社会条件，如健全的法治、信息的自由流动、良好的英语训练、对外来文化的熟悉等等。在这些方面，中国尚与印度差得甚远。中国的大学生，连年面临失业的威胁，很难找到这种和外面的世界直接打交道的工作，不能从对外开放中直接受益。于是，这些怀才不遇的青年，就可能成为“愤青”、“愤知”，与愤怒的底层社会合流，为之代言，成为既有秩序的颠覆力量。明清时代那些仕途被阻绝的生员阶层，就常常成为社会最不安定的一股力量。如果中国不改善培育服务业的条件，只在制造业上片面地突飞猛进，那么经济开放不仅不会带来文化上的开放，反而会培养文化上对经济开放的反叛。

如果说服务业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使不同的文化汇流，使封闭的心灵开放的话，制造业则可能用物质产品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乃至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对话给阻断，甚至导致心灵锁闭、文化排外。因此，在未来一二十年中，中国在文化上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陷阱：一个不健全的社会使制造业片面发展、服务业停滞，国际间的物流把中国人与世界在文化上隔绝起来，进而培育起对经济开放的文化反叛。而那种强调死记硬背、排斥外来文化的读经运动，则可能与这样的反叛遥相呼应，形成一种笔者所谓的“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结果，中国社会在文化上可能变得更加闭塞，发展服务业的条件更差。而服务业越不发展，就越会加强这种蒙昧主义的社会基础。摆脱这一恶性循环的出路，则是要从经济开放走向社会开放、文化开放，使中国成为一个法治健全、信息流动自由、文化多元的社会。在这方面，以回归传统为使命的知识界，已经有严重的失职。

学术就是学术

邓正来先生最近在《新京报》上发表文章，强调“中国学术欲发展，就必须建构起中国学术自己的自主性”，“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框架，实际上给西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论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并称“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些与学术相关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从另一个角度扼杀了中国学术建构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

这样的解释，未免避重就轻，转移话题。中国学术的问题，主要是我们自己的知识传统和制度问题，并不是什么西方“文化霸权”的结果。目前中国思想文化界，有一股狭隘的“本土主义”思潮。从甘阳的“华人大学的理念”，蒋庆的读经，到邓先生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呼声，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阵脚大乱的现实。什么叫西方的“文化霸权”呢？“文化霸权”这个词本身就是个舶来品。邓先生文章本身，就充满了诸如“语境化”等等艰涩的西方词汇。用这样的语言来反对西方的“文化霸权”，本身就是对这种“本土主义”的一个嘲讽。

学术就是学术。我们没有自己的学术框架，借用一下人家的，这就像国产车的引擎不过关，引进一个国外的引擎一样，是起步时之必须。中国的学者现在有个不好的风气：看到一个理论，不讨论这个理论本身是否有价值，是否对我们认识世界有帮助，而首先要看这个理论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一种“文化霸权”。这样的习气，笔者在国外读了10年书，还从来没有见过。美国一些大学，许多学者是外国人，许多讨论会都是国际性的，你很难用“西方”来定义。在人家那里，大家注意的，是如何摆脱自己文化中的思想习惯，看看“外来人”是怎么思维的，能不能借用。我们中国学者如果有令人信服的理论框架，那些西方人会马上搬过去。事实上，所谓反对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思潮，大都也是在西方的大学校园里开始的。中国学者的问题是自己拿不出东西来，所以才一天到晚在那里谈保这个反那个。

邓先生提出的移植西方学术制度的失败例证，也似是而非。西方国家的

大学和研究机构要求相关人员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和论著的制度，当然要学。据邓先生说，我们学歪了，那些善于搞“公关”的人常常拿到科研经费，发表更多的论文；那些有真才实学但不会交际的学者反而被淘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又说明什么呢？是说明我们太西化，还是不够西化？如果我们科研经费的审批程序、出版社的经营等制度都按西方的模式改革了，是不是我们的学术制度就会更公平一点呢？如果邓先生认为不该向西方学习，大学和研究机构是否应该不硬性要求有关人员发表论文呢？如此一来，学术评审的标准又该是什么呢？

“本土主义”者们一会儿发表个文化宣言，一会儿又要反对人家的“文化霸权”，但自己却提不出任何解决办法来。其实你到学术文化发达的地方看看就知道，人家那里，是绝没有我们这样的热闹的。学术就是学术，关键是拿出成果来。嚷嚷得凶干得少，只能说明我们创造性的匮乏，学术文化的衰落。

甘阳的清谈误国

甘阳最近在国内大学演讲，引用《波士顿环球报》社论的文章，说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美国则仅有 200 多年的历史。现在不应该是谈中国如何进入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的问题，而是美国怎么进入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体系。

这话初一听，很长中国人的志气，特别是出自一个有学术声誉的西学者，加上美国报纸的社论作为声援，就更具有煽动性。照此逻辑推下去，中国为什么要进入现有的世界秩序呢？我们应该自己独立创造一个世界秩序，并要求他人遵守。韬光养晦可以不必再提了。

众所周知，邓小平为中国所制定的“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国际战略，是中国近 20 年经济起飞的基础；大部分中国人都从中获益。这一战略的核心，就是在国际上采取低调、搭便车的方针，利用而非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加入 WTO、大量引进外资、人民币长期与美元固定汇率乃至最近中国企业的一系列海外收购，都体现了中国利用现有国际秩序为自己服务的战略。然而，正是由于这一战略使中国的国力大增，放弃韬光养晦的呼声渐起，特别是在民间，要求中国要说“不”的议论越来越大。李光耀不久前指出，邓小平一代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风风雨雨，知道现在的机会来之不易。他担心没有经过患难的年轻一代，体会不到韬光养晦的历史深意，一旦稍有国力，就不知道天高地厚，放弃邓小平的战略。

李光耀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目前不仅在受教育不高、年轻无知的“愤青”中民族主义情绪暴涨，而且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经历过一些患难的知识人，也开始迎合这种社会思潮。甘阳的言论就是一例。

这几年弗兰克的《白银经济》和彭慕兰的《大分流》在国内出版。称在 19 世纪以前，世界经济的中心在中国或者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至少不比欧洲差。欧洲人最后通过工业革命崛起，全靠所谓“地理运气”，碰巧发现了美洲大陆，否则中国和西方谁强谁弱还很难说。

其实，弗兰克是个缺乏职业训练的学者，自己公开承认在对比东西时根本没有阅读原始文献的能力，其《白银经济》是二手研究的大杂烩，很难称

得上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彭慕兰的书，事实错误也甚多，对欧洲发展的解释也从来没有被欧洲的历史学家当真。这两本书在中国走红，颇能说明学界的中国中心的强烈心理情结。甘阳的话则不过继续了这些海外自由派的学说，迎合了这种心理情结而已。

可惜，这种半吊子的大话，很难经得住学理上的推敲。中国确实有很值得骄傲的几千年文明，但这种文明，并没有创造一个国际秩序。即使在东亚大陆，从“安史之乱”后汉人政权就丧失了对周边地区的政治秩序的主宰，遑论世界。真正把世界打造成一体的，还是哥伦布以来的欧洲人。连《白银经济》的作者弗兰克也不得不承认，欧洲人通过白银制造了一个世界体系，连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也严重依赖白银的供应。从大英帝国到如今美国这个超霸，从以 WTO 为代表的世界贸易体系到联合国等国际政治体制，都说明制造现在这个世界秩序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

笔者并不是说这样的秩序代表了正义，只想指出这套秩序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目前还是我们要进入现有的国际秩序而非要求人家进入我们的秩序的时代，因为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自己打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能力，必须利用人家的资本、人家的市场、人家的技术在现有的秩序中求得生存空间。以中国为中心并没有错，但这必须是以中国的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某些中国人的心态为中心。如今 20 多岁的年轻人经历有限，血气方刚，说些极端的大话不足为怪。但像甘阳这样见过中国过去的苦难、也有些学识的长者，出言如此煽情，就未免有清谈误国之嫌。

文化帝国主义

20 世纪 80 年代末，肯德基在北京开张，顿时顾客盈门。当时报纸上有文章这样欢呼：“到肯德基吃什么？吃文化。”人们走进了肯德基似乎就走进了新文明。于是，随着肯德基的成功，麦当劳也接踵而至。

如今，私人车又成了消费新潮。私人车除了给人们带来舒适外，也代表着某种文化品位。私人车是成功、入流的标志，表达着人们对自由和私人领域的追求。不过，正像肯德基未必好吃一样，私人车给人带来的享受也是有限的。特别是在到处堵车、寸步难行的大都市，私人车带来的与其说是自由，还不如说是不自由。

肯德基、麦当劳和私人车，在我们这里实际上都被当作一种美国文化的象征符号。他们给消费者的心理暗示是：成功的、富足的生活就是美国式的生活。

本来，生活方式因环境而不同，无所谓优劣。中国历史上人口稠密，缺乏发展畜牧业的空间，结果中国人食肉较少。同时由于燃料紧张，有肉也多以肉丁、肉丝式的形式食用。一个菜几分钟炒就，对炭火要求甚少。西方历史上人口密度小，畜牧业发达，食肉较多，同时燃料丰富，肉可以大块烧烤。美国感恩节的火鸡要烤上一天。在工业化以前，中国人怕是买得起火鸡也买不起木炭。但若因此说鱼香肉丝比烤火鸡难吃，未免荒唐。

然而，包括商业广告在内的美国文化产品，不遗余力地宣扬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形成了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其目标，就是取消根植于不同生存环境的不同生活方式，确立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地位。因为美国的企业最懂得如何为美国的生活方式提供产品，世界越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的企业就越有先人一步的竞争优势。本来，在改革以前，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中国人除了填饱肚子外，没有选择生活方式的余地，近年的经济发展，正在给人们提供这种选择。但是，在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之下，人们除了模仿美国的生活方式外，几乎别无选择。

如今在中国的大城市，虽然有钱买得起私人车的人还是少数，但自行车